

作家文库系列

WANGPENG

ZHUANJI WENXUE XUAN

ZHONGGUO DE XIBEI JIAO



王蓬传记文学选

中国的西北角

——多位学人生涯的探寻与展示

(上)



西安出版社



作家文库系列
王健传记文学选

作者多年探幽发微、寻叩访问，独辟蹊径写出一批历史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大写的人，其中有在修筑第一条穿越秦岭的现代公路中，保护石门石刻的工程师张佐周，有开发大西北的先驱安汉……

中国的西北角

(上)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西北角:王蓬传记文学选/王蓬著. — 西安:西安出版社, 2011.1
(作家文库系列)
ISBN 978-7-80712-718-5

I. ①中… II. ②王… III. ③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9457号

作家文库系列·王蓬传记文学选

中国的西北角

——多位学人生涯的探寻与展示

著 者:王 蓬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029)85253740

网 址:www.xacbs.com

邮政编码:710061

印 刷: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42.25

字 数:526千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12-718-5

定 价:68.00元(上下册)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宋·张载



王蓬传记文学特色与价值

——评《中国的西北角：多位学人生涯的探寻与展示》

(代序)

韩梅村

王蓬最早是以小说蜚声文坛的。他的短篇小说《批判会上》(后更名为《牛绳大爷》)、《银秀嫂》、《桂芳婆婆》、《油菜花开的夜晚》、《沉浮》;长篇小说《山祭》、《水葬》等都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后,王蓬则以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合的方式,历经数十载,终于完成了蕴含着丰厚文化韵味、具有开创价值的《中国蜀道》和《从长安到罗马》两部散文巨著,被专家一致看好。至于传记文学创作,似乎至今仍未真正进入传记文学研究专家的视域。其实,王蓬的传记文学创作,同他的小说、散文创作一样,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他的《巴山茶痴》1989年9月10日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后,《新华文摘》很快于当年第11期全文转载,不久,即获得了《人民日报》建国40周年征文奖,名列榜首;他的《功在千秋——记一位护卫国宝的公路专家》在《人民公路报》于1997年3月15日至5月18日相继连载,《人物》杂志又于1997年第4期转载,《丝绸之路》也在相隔将近两年之后,于1999年第3期予以转载。可谓影响广泛而久远。只是由于《巴山茶痴》当时是以“报告文学”的名义收入这本传记文学集的,《功在千秋》等诸多传记文学作品则是由于当时





散见于王蓬其他著作集或一些刊物的缘故，这才使王蓬传记文学创作未能及时引起传记文学研究专家的关注。

王蓬传记文学创作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特色。

特色之一，是相当集中地将在祖国大西北生活或曾经生活过的20位传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遭际艺术地展示给人们。

在这些传主当中，像安汉，出生于陕西南郑，留法归来，组织农业考察团，历时八载，足迹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察哈尔（今内蒙、河北各一部分）、热河（今河北、辽宁、内蒙各一部分）、绥远（内蒙）、新疆等地，考察农、林、水利等情况”，将自己短暂的生命全部贡献给了西部（《大地赤子》）；像王范堂，出生于陕西石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期间，奔赴抗日前线，以57人敢死队队长身份参加了台儿庄血战，铸造了生命的辉煌（《台儿庄敢死队队长沉浮录》）；像张佐周，出生于河北保定，一生为国家主持修筑了多条公路，对他说来，“最有意义”的，却是抗战前夕主持修筑西汉公路留坝至汉中段时，对以石门石刻为代表的古文化文物的完整保护（《功在千秋》）；像王世镗，出生在天津，后流落陕西安康，定居汉中，成就了他的“皇皇书艺”（《墨林风云》）。总之，作家笔下传主，虽或出生于西部成就事业于西部，或出生于东部成就事业于西部，都和西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别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具有一种崇高的人格精神，在漫漫人生道路上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昂扬心态和坚韧不屈的个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多大困难，都不怨天尤人、消极颓废，而是坚持面对困难，接受困难的考验。我以为，正是传主身上的这些特殊之处打动了作家，驱使作家将传主的生命历程真实而艺术地传达给广大读者，从而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





特色之二,是对传记文学真实性品格的不懈追求。

这里所说的传记文学的真实性,自然涵盖着人们经常所说的,诸如情感真实、心理真实、历史真实等等,但最重要、至为关键的,则是生活的真实。这就是说,只有当传记文学作家在对传主生平事迹做出如生活自身那样真实(符合历史真实)的叙写时,才称得上传记文学所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真实,那样的文学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作品。

王蓬显然有着一种文体意识的高度自觉。为了写好自己的传记文学作品,围绕传主,他做了大量的、充分的、扎实细致且又十分深入的准备工作。在王蓬看来,只有当这种准备工作做到不可能再细致深入的程度,传主生活的时代环境可以清晰地触摸到、传主形象活脱脱地站在自己面前时,才可以全身心地踏实地投入创作。如他创作《功在千秋——记一位护卫国宝的公路专家》,就是在“翻阅蜀道的资料中,无意中见到1934年抗战前夕,修西汉公路时,一位叫张佐周的工程师保护石门古迹的往事”(《继承阙失的文明》)时,心生敬意,从而产生了为张佐周立传的强烈愿望。然而王蓬为了写好这篇传记文学作品,除了广泛阅读相关史料外,从1995年冬天起,先后几次赴上海对传主进行面对面的深入采访,并且根据传主的介绍回忆和提供的图片等数据,又奔赴褒谷口,对传主所创业绩的历史“现场”进行悉心地考察和感受。正是在这种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基础上,终于顺利完成了这篇传记文学作品的创作。王蓬为了创作童年时代曾让他感到“神情威严”,“很长时间”都有一种“畏惧”心理,“几乎整整三十年后”才知道那位“老人”原来“就是当年血战台儿庄的敢死队队长王范堂”这一人物传记,不仅大量翻阅了有关史料,特别是借助就近之便,“断断续续”对传主进行了“将近十天采访”,直到“半个世纪前那场气吞山河的民族战争恍然在眼前重演”(《台儿庄敢死队队长沉浮录》)时,才开始动笔。不仅如此,作家为了写好这部传记文学作品,还搜集到了当年王范堂的老上级、原国





民党三十军军长鲁崇义,血战台儿庄时任营长的战友郁天鹏(王范堂当时任连长)、部下勾英华,抗战时被誉为三大名记者之一的陆诒,共同组织领导了成都起义的原师参谋长于国谦(王范堂当时任副师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副主任韩信夫等人给王范堂的亲笔信件。这就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这篇传记文学作品内容的信实无误。为了采访“破译一个神秘王国的‘神秘天书’”的我国著名学者、西夏学研究专家李范文教授,王蓬本着“阅读其著作,掌握其情况”(《破译“天书”》)的一贯采访原则,经过多年准备,“方才于2004年与李范文先生联系”,直到“2008年国庆”,“感到采访李范文教授的时机成熟”时,这才动身前往(出处同前)。而这就充分保证了他采访内容的真实与准确。

不仅如此,王蓬还要求其笔下传主一生行踪,不但在大的关节上具有事实的真实性,而且在其细微末节处,也力求符合事实真相。如在《台儿庄敢死队队长沉浮录》中,作家通过抗日战争时期王范堂亲身参加的卢沟桥保卫战、娘子关恶战、台儿庄血战、武汉保卫战、中原运动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实施的成都起义,真实地表现了王范堂作为一位抗日英雄生命的辉煌。在对人物生平有关细节的描述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作为57人敢死队队长、血战台儿庄时具体战斗过程的叙写。通观作家所述,除少数几处,如在一个地方用了“健步如飞”这样的描述性词语外,其余都是直陈其事,特别是作家还具体描写了一个队员挺身解救队长王范堂的动人场面。我以为,这不仅无损于王范堂血战台儿庄的英雄形象,而且让人真实感觉到了与敌寇肉搏现场形势的错综复杂,只有官兵之间协同一致,才能克敌制胜,从而显得格外真实。王蓬不仅真实叙写了王范堂生命历程中英雄的一面,还写了他曾两次面临命运的转折,却都由于各种具体原因而坐失良机,从而成为人生一大憾事的史实。这里,作家没有为尊者讳。我以为,这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王范堂。又如,作家为“校对过鲁迅先生文章的农民”张涤尘立





传,在大的关节上,则通过“困顿家世”、“三生有幸”、“离乡从戎”、“乱世婚姻”、“编遣回沪”、“重返陕南”、“坠入底层”、“足慰平生”生命历程的描述,真实反映了其曲折复杂的命运轨迹;而在细节上,如写传主在“编遣回沪”后的狼狈不堪情状等,也严格遵循生活的真实。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作品中涉及的每一事件及其细节,都是作家通过对传主及其亲友多次采访、反复核实后方写入作品之中的缘故。

特色之三,是在时代潮汐的涌动中展示传主命运,揭示传主性格。

传记文学要求于作家的,是在一定时代氛围的铺陈当中,通过传主独特行为方式和心理方式的艺术传达,真实勾勒出传主人生历程,揭示传主独特个性,刻画传主形象。王蓬在《大地赤子——记开发西部先驱安汉》中,将对传主安汉人生历程的记述与对其所处时代真实状况的勾画描绘紧密结合起来,从而真实展示出,处在“五四”运动前夕以至抗日战争中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安汉的命运轨迹。作品通过传主“考进陕西省在汉中创办的首所农业学校”,毕业后,“义无反顾”地远赴法国,专修现代农业,归国后,经于右任先生举荐,任国民政府实业部农林署技正,“主动请缨,从1931年开始,组成大西北农业考察团,到1938年考察陕西黎坪垦区,前后历时八年”,“六赴西部”,“撰写了四部科考专著”;“为解决入陕难民生计问题”,从1938年秋天开始,又先后担任陕西省黄龙垦区和黎坪垦区管理局局长,对我国西部实地进行开发,为支援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生轨迹的描述,真实展示了安汉作为“在陕西五千年文明史中”,“被列入一百位有突出贡献的著名人物,被誉为开发大西北的先驱”的崇高个性和人品。《巴山茶痴》主人公蔡如桂大学毕业于1966年夏,因“文化大革命”原因推延至1968年分配。因此,其从事的茶叶研制事业,实际上包括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两个时间段。是否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氛围曾让许多青年学子一时感到前途迷茫,知识无用;但对于视茶叶事业为生命的蔡如桂来





说,却丝毫未能动摇他攀登高峰、创制名茶的理想。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会在工作地点的选择上,毫不迟疑地与那位生病的同学对换,主动奔赴条件虽然艰苦却可以充分施展才华的茶叶之乡陕西镇巴;决定了,一到镇巴,他便全身心地投入茶叶的研制开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时代氛围也决定了蔡如桂的茶叶研制开发之路必然充满曲折、艰辛与坎坷。历史进入新时期,社会的大环境是越来越有利于蔡如桂事业的发展了,蔡如桂的茶叶研制开发事业也确实一度得到了健康的发展;然而他正直的知识分子个性却又使他赖以生存、发展的具体生活环境变得艰辛起来,以至于锒铛入狱。作品就是在充分展示蔡如桂面临的各种艰难环境过程中,真实描述了他对茶叶研制、开发事业一往情深、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成功表现了他为理想而奋不顾身的崇高人格。

王蓬在表现时代与传主关系时,始终将二者融为一体,即在对时代的描述中带动人物,在对人物的表现中刻镂时代,俾其二者相互推动,互为表里。这样,其主人公是生活在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时代则是刻印着主人公生命历程的特定时代。这就使其笔下主人公一个个成为既充满时代感又表现出鲜明个性的“人”。

特色之四,是其多样化的艺术传达方式。

文似看山不喜平。传记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我们绝不能因为传记文学是一种以史笔方式叙写传主生平的文体就刻板地以纪年的方式,对传主生平逐年逐月地加以铺陈,那样的话,就不是我们所说的传记文学了。王蓬深悟传记文学三昧,所以他在进行传记文学创作时,总是依据传主人生经历实际而采用了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法。

其中,有的传主在某一领域独领风骚,却长期被埋没,甚至一度遭人误解——作品即以此作为切入点,展开对传主人生历程的叙述。如《墨林风云》一文为被于右任先生赞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





世无与并”的章草大师王世镗立传，既不是从传主家世入手，也不是一开始即以惊人之笔，写王世镗先生在章草领域的卓越建树和崇高地位，而是出人意料地以“离奇章草案”起头，写1925年前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卓君庸先生购回一本采用了其实早已被王世镗放弃、却被“几位有心计的人收藏”下来的“弃石”拓印出来的署名王世镗的《章草草诀歌》书帖，未能深加探究便大兴问罪之师，请在北京的几位书法大家以序跋的形式，批评“歌”帖所收的字“定为明代高手”所写，因此贸然认定王世镗是“抄袭古人”。作品即围绕“离奇章草案”这一事件展开叙述。在叙述过“离奇章草案”始末后，才顺着“曲折仕途”、“皇皇书艺”、“天命使命”、“夕阳晚照”的逻辑次序，系统而完整地表现出王世镗在章草领域兴衰继绝，成为一代大师的详细过程。

有的传主则是在某一行业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著名专家，所以就以传主最具有成就感的事件作为切入点和阐发点，从而形成了一种倒叙式的艺术传达方式。如《巴山茶痴》就以传主蔡如桂荣获国家级金奖的名茶“秦巴雾毫”起头，然后再闪回到二十多年前，从头述说其如何主动来到汉中镇巴，历经坎坷，终于研制出了名茶“秦巴雾毫”的。再如《台儿庄敢死队队长沉浮录》也采用了这一表现手法：先写作家童年时代于褒城县文化馆前总是看到一位“神情威严却目光慈祥”的老人，“几乎整整三十年后”才知道那位老人原来就是当年血战台儿庄57人敢死队队长王范堂——作品即以此作为进入传主人生叙述切入点，然后让读者和传主一起走进历史深处，跟踪传主人生足迹，阅读传主为反抗日本侵略者而搏击沙场的感人业绩，最后再一步步从历史深处走向“现实”。

有的作品则采取一种欲扬先抑的艺术传达方式。如王蓬于《在中国，有这样一位作家》中，从与传主查舜在鲁迅文学院同学写起，先写传主“没有获过全国奖，没有一听就让人肃然起敬的作品；头上也没有‘主席’、‘主编’之类的桂冠；更没见他逢人，尤其是逢女人，就转弯抹角地





介绍自己的作品,炫耀自己的地位,那么也就好像缺乏点儿‘知名度’”。再写“第一学期没见他有引人关注的作品。第二学期也没见他捧出让人刮目的力作”。三写放创作假,同班同学纷纷被邀请参加笔会,查舜却没有受到邀请,他先是愤愤不平,然后就完全沉默了。王蓬接着不是写查舜如何在沉默中爆发,而是笔锋一转,从查舜童年时代写起,历述其坎坷身世,及其在困难重重的人生道路上打拼所形成的坚韧不屈性格。作品正是以此为基点,写查舜在这一性格下,先是凭借短篇小说《果园里的孩子》登上文坛,接着又以中篇小说《月照梨花湾》而声名鹊起,再是长篇小说《穆斯林的儿女们》,更是让他成为“在同时代青年作家中”“扬名吐气的一位”著名作家。

有的作品开头则颇有点“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的味道,实际上却是在为传主出场创造气氛。如王蓬在写《功在千秋——记一位护卫国宝的公路专家》时就采用了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作品开头,不是依照常规,直接写哪里有什么国宝,它和这位公路专家有何联系,这位公路专家是如何护卫国宝的等等,而是先从大处落墨,写刻石、摩崖,及其在古代的文化传播功能;刻石、摩崖历经岁月冲洗,现在保存状况及其文化价值,由此一步步,写到石门石刻荒唐岁月经历的磨难,写到被抢救下来的《汉魏石门十三品》在历史新时期引起的广泛关注等。经过这样层层烘托,这才点到石门石刻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面临一次全部毁灭”的危险,却奇迹般地“被完整保护下来”。这时人们不禁会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作家才顺应读者心理期待,徐徐拉开历史帷幕,让其笔下主人公张佐周从云山雾海中走出来,走到广大读者的面前,并且就此展开对传主“功在千秋”历史壮举的详细陈述。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于王蓬在进行他的传记文学创作时,运用了多样化的艺术传达方式,所以阅读王蓬传记文学作品,常会产生一种





“乱花渐欲迷人眼”(白居易《钱塘湖春行》)的审美感知。

特色之五,是作品丰厚的文化底蕴。

所以会形成这一特色,是因为王蓬笔下传记主人公有作家、翻译家、书法家、美术家,也有拓印世家、茶叶专家、农学家、公路专家、抗日英雄、校对行家等多种行业代表人物的缘故;而王蓬想要写好这诸多门类的代表人物,就不仅要熟悉这些传主一般心理和行为,更要熟悉这些传主所从事的不同行业及其在本行业中所表现出的特殊心理和行为。王蓬为了写好这些不同类型的传主,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曾经下了很大的工夫,所以当我们阅读到描述拓印世家开山祖张茂功在巨大的山崖面前,凭借自己的超稳定心态和出神入化的拓印本领,将那些镌刻在山崖上的文字完整无损地拓印下来的话语时,确实深深感受到了一种特有的拓印文化的浸染;读到王世镗先生在章草领域兴衰继绝,日复一日地进行不懈努力终成正果的文字时,便会深深体认到,章草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书法艺术,其内涵的丰富深邃,以及王世镗超越前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正是在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作品阅读中,书中那丰富多彩而又十分专门的各种“文化”,不断地丰富着我们的知识库存,提升着我们的文化素养,健全着我们的人格结构。

二

王蓬传记文学作品的突出特色决定了它的独特价值。

存史价值:

从传主方面看,王蓬笔下的每位主人公,都既是单个的人,又因生活社会当中,而具有鲜明的社会色质。因此,他们的语言、行为就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像《功在千秋》传主张佐周抗日战争前夕主持修建的西汉公路留坝至汉中段,以及在修筑这段公路过程中对石门石





刻和武休关等文化文物的保护,还有他参与修建的沪杭、杭徽、滇缅、乐西、西兰等多条公路,这些,可说是个人的,但更是社会的,不仅对我国公路建设,甚至对推动整个社会进步,都是功莫大焉。

而就社会方面而言,它总会在传主身上打下深深的印记。如《风雨人生》传主王智量,一方面,他曾“荣幸地参加了那个永载史册的日子——开国大典”,还接受动员,由法律专业改学俄语,“荣幸地参加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俄语专业的筹建”,后又“被调进刚刚组建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担任实习研究员,并兼做所长、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助手”,历史新时期被著名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聘请到华东师范大学等;另一方面,在1958年被莫名其妙地补划为“右派分子”,然后下放劳动改造,先是河北平山、昌黎,妻子离婚,饥饿岁月又被发派到灾难最为严重的甘肃山区,由饥饿而患病,被迫辞去公职而沦为流民,投靠哥嫂,打扫街道,担任代课老师,“文革”中遭批斗,被下放里弄小厂劳动改造,路边修伞、补鞋,到江边扛木头,再到1973年二次做代课老师,又担任临时翻译,直到“文革”结束。这一人生经历虽然是王智量个人的,却明显烙记着深深的时代印记,因此,其存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认识价值:

王蓬在为他的传主立传时,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种解析式的艺术结构:即作家在叙述传主人生经历和命运遭际时,自觉地将其对传主人生经历和命运遭际的解读分析融入对传主人生经历和命运遭际的叙述之中,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读者当然还可以就此做出属于自己的解读)。而这就使这些作品具有了一种深刻的认识价值。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大地赤子》。在这篇作品中,作家倾注笔墨,详细记叙了安汉在“八年科考”、“六载农垦”过程中,理论上的杰出建树和实践上的突出业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大功于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却被残酷杀害,演出了一出时代的大悲剧。为此,作家专设“蒙难始





末”一节，以叙述的“笔法”，深入探究了安汉被害的各种复杂因由。又如作家叙述《巴山茶痴》主人公蔡如桂大学毕业时，主动放弃城市的繁华生活而来到偏远贫穷的汉中市镇巴县山区；在镇巴山区他经历了超乎寻常的贫困和艰辛却无怨无悔，还将妻子从繁华的城市动员到镇巴山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他总是“利用到各处当工作队的机会”，忙里偷闲地“对茶区进行调查”，文革后被诬陷入狱，居然在狱中又“重新学习了大学课程和有关茶叶的最新专著”，获得了“对人间社会乃至万物天体”“通达的感悟”，已经身陷囹圄还“两次打报告”，“提出可以让管教人员背上枪跟着监视”，“去茶山完成实验”。在王蓬看来，他的传主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方成正果，创制出了国家级名茶“秦巴雾毫”。有意味的是，作家在表达其对这些传主人生经历的解读时，不是把自己的认知硬塞给读者，而是通过传主人生经历的叙述，自然地融入对传主人生经历的分析、解读，使读者在一种不知不觉地阅读当中，获得了对围绕传主经历的每一事件正确而深刻的认识。

文化价值：

这是由表现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如前所述，王蓬笔下传主，多为曾在祖国大西北工作或生活过的各方面专业人才，有的还是其所在领域的顶尖级人物，在该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如作家写作《大地赤子》，就要写出传主安汉作为著名农学家，在农业理论和实践以及开发西部等诸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写出安汉通过八年科考、六年农垦形成的理论及其在理论指导下创造性的实践在历史上的价值和在当下的重大意义，无疑具有重大文化价值。又如《功在千秋》主人公张佐周，其负责的西汉公路留坝至汉中段，经过的路线，既有南宋吴玠、吴玠兄弟抗击金兵的武休关，更有汉魏以降保存于褒谷口一带的大量摩崖石刻。当时年仅二十余岁的张佐周，自觉到这批文物的珍贵，毅然决然对原先设计的路线进行了“改线”，从而既保留了这批珍贵文物，又出色完成了公路





修筑任务,并因此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公路文化。再如《百年沧桑》主人公张茂功及其传人,为了传播以《石门十三品》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书法艺术,刻苦学艺,自觉加强传统文化修养,提升自身人生境界,从而创造性地实现了对石门石刻完美无缺的拓印,传递了石门石刻的灿烂艺术文化。总之,阅读王蓬充满文化意味的传记文学作品,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沉潜其中,品味、接受那些艺术地传达给我们的前人所创造的灿烂文化。

审美价值:

客观地说,大凡优秀传记文学作品都有其审美价值。王蓬传记文学作品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于,其笔下传主大都是各行各业里的专家,甚至顶尖级人才,对国家昌盛、民族振兴,都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他们中有的却英年早逝,有的被历史淡忘,有的遭人暗算,有的曾长期蒙受冤屈,大多在人生的道路上都走得坎坎坷坷。因此可以说,王蓬是在一种如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所说的“不得其平”的心理状态下为这些人物立传的。

而这就要求王蓬在为这些人物立传时,必须严格控制自己的感情,以真实确切的事实为依据,通过充分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写出这些人物或崇高或优美的个性。王蓬显然做到了这点。他在进行每篇传记文学作品创作时,都能依据传主具体生活时代,尽可能地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或主要通过传主交往,细读传主作品,了解熟悉传主(如陈忠实、路遥、查舜);或通过对传主的深度采访,阅读相关历史文献及文章,了解、熟悉传主(如王范堂、张涤尘、蔡如桂、张佐周、李范文、王智量);或主要通过查寻与传主有关的历史资料、研究文章,解读传主遗留下来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访问传主后裔、亲友、上级、同事、下级,了解、熟悉传主(如王世镗、安汉、张茂功、左明)。而在进入创作过程后,则又尽量调整好自己心态,做到心态平和,以审美的目光对待自己的传





主及其人生历程,坚持以准确的事实为依据,在对事实客观真实的叙说中,展示传主人生历程,凸现传主独特个性,绝不悬空议论或抒情,最多在关键时刻轻轻点示一笔。如在《校对过鲁迅先生文章的农民》中,当写及1947年7月,传主张涤尘被所在的国民党某器材库因官员更换而被编遣回沪,从此很过了一段恹惶日子时,不禁议论道:“可他还没想到,若是和日后遭际相比,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仅此而已,而且这实在算不上真正的议论,因为这句话尚有为下文埋下伏笔的功用,将其称做涉后叙事也未尝不可。总而言之,我认为,王蓬的传记文学作品有一种不同于其他作家传记文学作品的独到之美,一种其他传记文学作品所无法取代的审美价值。

通过上述粗略分析,已可初步看出王蓬传记文学作品的特色与价值。当然,与那些专业传记作家相比,王蓬的传记文学作品,数量还不够多,特别是至今尚无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问世。我以为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王蓬在进行传记文学创作时,能够以其传主选择的独特性、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以及艺术描写的解读性特质而令人耳目一新。而这,就使他的传记文学作品别有一种意义与价值在。

二〇一〇年元旦于鸿兴堂之暗香居

此文原载《荆楚理工学院学报·传记文学研究学专号》

2010年第25卷·3期

注:韩梅村,文学评论家、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创作出版《走近唐音阁——霍松林研究四题》《王蓬的艺术世界》《人生多棱镜》等多种学术著作。

